



引用格式:姬建敏. 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1): 85-93.

中图分类号:G237.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1.009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1-0085-09

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 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研究

Study on the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journals of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first decade after the opening and reform

姬建敏^{1,2}

Ji Jianmin

1.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2. 河南大学 学报编辑部,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是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史上发展最快、成就最突出的10年。审视这10年走过的历程,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是其发展的政治环境,高等教育迅猛发展、期刊出版空前繁荣是其发展的学术环境;1978—1981年是其调整恢复期,1982—1988年是其快速发展期。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在办刊宗旨、文章内容、学术论文刊发比重、转载数量方面等均坚守了其学术性的本色,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繁荣。从1978年开始,在我国,“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成为时代的主题词。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作为社会发展与改革的感应器、思想与学术的展播台,关注社会现实,记录时代律动,在推进思想解放、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依托高校学术方向、学科优势和地域特点,形成期刊特色,对学校建设和区域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

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
社会环境;
发展状况;
学术特色;
学术贡献

收稿日期:2018-01-05

作者简介:姬建敏(1964—),女,河南省偃师市人,河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大学传媒研究所研究员,河南大学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播、编辑出版。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从“文革”结束时的小树苗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森林,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综观学界对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研究,除了宋应离编著的《中国大学学报简史》和马宇红编著的《中国大学学报发展简史》对高校学报(既包括社会科学学报,也包括自然科学学报)进行研究外,还没有见到专门研究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专著出版;至于论文,在中国知网用篇名“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查询,也少见对高校社科学术期刊110多年历史的系统研究,甚至连一个阶段、一个时期的研究都没有看到。鉴于此,本文拟对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文中除特殊需要标注相关学报版别的,其他不再一一标注)进行研究,权作抛砖引玉,以期助力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研究与发展。

一、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办刊环境

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期刊发展的先决条件。以客观的、历史的眼光审视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办刊环境,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是其发展的前提,高等教育秩序的恢复与迅猛发展、社科学术研究与编辑出版业的空前繁荣是其发展的学术环境。

1. 政治环境: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拨乱反正成为第一要务。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必须以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先导。而当时由于“文革”10年造成的政治思想上的混乱还没有消除,也由于“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拨乱反正受到了严重阻碍。1978年5月,一场席卷全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拉开了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

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针对“两个凡是”,文章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们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凡经实践检验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不应再坚持。文章见报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引起强烈反响。不久《解放军报》与此呼应,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这次大讨论不仅有力地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破除了现代迷信,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进行,而且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舆论准备。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重新确定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也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2. 学术环境:高等教育与期刊出版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它既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制约,也受制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文革”10年,高考中断,人才断流,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包括教育秩序都处于混乱甚至是荒诞之中。1977年9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起草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渴求知识、渴望成才的七七届、七八届新生涌入大学校园,标志着中国社

会从动荡走向稳定,从只讲阶级出身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复苏、教育秩序和知识价值的回归。之后的几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招生人数不断增加,本科教育制度、研究生教育制度和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广大高校师生思想解放,意气风发,有理想、有追求、有思想、有激情,不仅为建设“四个现代化”刻苦学习,而且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且不说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仅就当时的学生来说,就发表了相当多的学术研究成果。比如,《史学月刊》(河南大学主办)前主编李振宏,1980年还是河南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就在《文史哲》发表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吗?》一文,对宋史权威漆侠的观点提出质疑。^[1]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沈卫威,1984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在《河南大学学报》发表处女作《端木蕻良和他的〈科尔沁旗草原〉》。^[2]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华中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马敏1980年代读硕士时也分别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3]《史学月刊》^[4]上发表过文章。很多人认为,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迸发、盛产“大家”的年代,而这离不开媒体的传播。在那个刚刚结束书荒、刊荒的年代,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压抑已久的对精神文化的强烈需求,出版业迎来了井喷式的大发展,图书、期刊、报纸等以几何级数增长,期刊出版空前繁荣。1985年,中国期刊发行总数25.60亿册,全国人均期刊占有量首次突破2册。^[5]¹⁷⁹不仅数量“疯长”,而且种类多样化、多质化。以学术期刊中的高校社科学报为例,1981年,全国有近200种;1987年10月,已达393种;1988年8月,增至410多种。^[6]²⁸⁷⁻³⁰²

可见,在经历了粉碎“四人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高校的社科学术期刊乘着思想解放的春风,借助高等教育的发展、科学研究的兴盛、期刊出版的繁荣,在改革开放第一

个10年迎来了第一次大飞跃、大发展。

二、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发展状况

有学者认为,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110多年的发展历程跌宕起伏、波澜壮阔^[7],那么,相对于其他阶段而言,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则颇为顺利。1976年“文革”结束,由举国欢庆、百废待兴到拨乱反正、短暂调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一如各行各业一样迅速走上快车道。回顾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历程,1978—1981年是恢复调整期;1982—1988年则是快速发展期。

1. 恢复调整期

“文革”10年,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出版工作受到了严重的破坏。1977年,在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时代大潮裹挟下,遭到破坏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出版工作逐渐恢复。1978年4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978年5月,全国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1978年6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同时召开了高校学报工作座谈会并制定了《关于办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意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成为我国基本国策。这不仅促使“文革”中被停办的高校学术期刊得到尽快复刊,而且也催生出一些新的学术期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0年底,我国高等学校编辑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55种。其中综合性大学学报31种,师范大学(含师范学院)学报49种,师范专科学校学报47种,语言、财贸院校学报17种,政法院校学报2种,民族院校学报6种,艺术美术院校学报3种。在这些学报中,直接冠以校名的学报约130家,另取新名的有近

30家,著名的如云南大学的《思想战线》、山东大学的《文史哲》、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北方论丛》等。^[8]1980年代初,我国大学学报不仅数量多、门类全,而且还有自然科学版与社会科学版之分、综合性与专业性之别。专业学报又分财经类、政法类、管理类,等等,盛况空前。

与高校社科学报一样,这一时期的高校专业学术期刊也处在复刊、创办、发展期。以北京大学为例,1978年,法学院创刊了《中外法学》,南亚研究所创办了《南亚研究》;1979年,经济学院创办了《经济科学》;1980年,国际关系学院创办了《国际政治研究》;1981年,外国语学院创办了《国外文学》,图书馆创办了《大学图书馆学报》等。还有一些在今天颇有影响的名刊大刊也在这一时期创刊。例如,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创刊的《比较教育研究》,上海财经学院创刊的《外国经济与管理》;1980年,武汉大学创办的《图书情报知识》;1981年,复旦大学创刊的《新闻大学》,等等。这些都标志着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正在进入快速发展期。

2. 快速发展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国各条战线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喜人局面。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经济上的持续发展、稳定上升,给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包括出版和学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198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了出版物的商品属性,解放了出版生产力;1984年,思想文化领域全国性的“文化热”逐渐达到高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研究氛围越来越浓厚;许多省市和地区的社科期刊工作者先后成立了诸如期刊协会、编辑学会、学报研究会等组织,许多高校的院、系、所先后创办了出版社、杂志社,出版各种类型的学习杂志、专业研究杂志等,高校社科学术期刊迎

来了快速发展的“疯长期”。以高校社科学报为例,继1978年的武汉大学会议以后,1984年4月,教育部在北京大学召开了“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座谈会”;1988年11月,“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成立。前者对如何进一步办好高校社科学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和指示,后者结束了全国高校社科学报“一盘散沙”的局面。在教育部社科司的直接领导下,在行业组织“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引领下,1980年代不仅国家直属重点高校、部属高校、省属高校办有自己的学报,而且地处偏远地区的师专、师范,以及改革开放后才批准成立的地方大学,也基本上都办有自己的学报,并且有些还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如《楚雄师专学报》、《呼兰师专学报》、《思茅师专学报》、《保山师专学报》、《阴山学刊》(包头师范学院主办)、《深圳大学学报》、《平原大学学报》等。它们的出现,壮大了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队伍。统计资料显示:1980年代的高校人文社科学报从1981年的150余种、1983年的208种、1985年的277种、1986年的360种、1987年的393种,增加到1988年的440种^{[5]235}。截至1987年10月,高校文科学报已达393种,到1988年8月,增至410多种,全国大学学报总数超过1000种,不仅比1978年增加一倍以上,而且占全国6200种期刊的1/6左右。^{[6]302}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著名高校的社科期刊,如《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1986年创刊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是1987年创刊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华中师范大学的《教育研究与实验》是1983年创刊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发展与教育》是1985年创刊的,《教育学报》是1988年创刊的。另外,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出版科学》(1986年试办)、湖南师范大学的《古汉语研究》(1988年创刊)、东北师范大学的《古籍整

理研究学刊》(1985年创刊)、中国传媒大学的《当代电影》(1884年创刊)、吉林大学的《当代法学》(1987年创刊)、山东大学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84年创刊)、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外语教学》(1985年创刊)、南开大学的《南开经济研究》(1985年创刊)等,都是这一阶段创办的刊物。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创办之多、发展之快,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以最新公布的CSSCI来源期刊为例,2017—2018年CSSCI来源期刊共收录社科学术期刊554种。据笔者统计,在这554种来源期刊中,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有289种,占比52.17%;而在这289种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中,1978—1988年创刊的有153种,占比52.94%。也就是说,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中,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数量已过半;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创刊的至今仍很有影响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数量也过半。这里且不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在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中的分量和影响有多大,只说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创办的数量之多,就在中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110年的历史中让人叹为观止,其对中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奠基之功不言而喻。

三、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特色与作用

出版物以内容为王,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内容与质量,从一定程度上说决定着它的前途与命运。回顾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从内容上看,尽管还受到“左”的影响,没有完全挣脱政治对学术的羁绊,但已开始最大程度地追求学术性,探索学术话题,回应现实社会需求和意识形态关切,其特征鲜明,作用突出。

1. 回归学术,促进学术繁荣

学术期刊的标志、特征和本质都是学术。“文革”10年,大多数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游弋于

学术与政治之间,少数甚至以政治代替学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邓小平提出了“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9]之后,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开启了从政治回归学术、以学术为本的办刊理念,促进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自由开放的学风、文风、刊风在1980年代的流行。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回归学术,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办刊宗旨方面。以1987年创刊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为例,其创刊号《发刊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其他国家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体制改革中提出的新课题,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进行创造性的探索,欢迎对于现实问题所进行的一切有益的探讨,为那些在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档案学、管理学等一切社会科学领域发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补充新论据的具有新意的文章提供园地,努力促进开发新学科、推广新思想、树立新学风,并注意在这一过程中扶植新人。^{[5]232}其不仅强调学术——“研究……新课题”,“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而且突出创新——“为那些……发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补充新论据的具有新意的文章提供园地”,尤其是一个“创造性”和几个“新”字,对学术创新的重视和以学术为本的思想跃然纸上。其实,办刊宗旨作为期刊的指导方针和行动大纲,代表了期刊的主导思想,反映了期刊的灵魂。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其他重新复刊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和新创办的期刊,复刊词或发刊词大多秉持发展学术、繁荣学术的思想,强调创新,看重创新。比如,1980年创刊的《高

等教育研究》(华中工学院主办)突出高等教育的研究性质,刊发高等教育综合研究的新成果;1981年创刊的《社会》(上海大学主办)则重点刊发国内外社会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1982年创办的《科技与出版》(清华大学主办)融科技、出版于一体,着重新内容、新信息的传播;1884年创刊的《当代电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注重刊发有关电影理论、电影创作的思考与探索的成果。可见,这些刊物不仅从办刊宗旨上凸显了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创新的品位,而且彰显了为学术发展、学术繁荣服务的理念和气度。

二是在文章内容方面。在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发表了一大批学术性、理论性都很强的研究性文章。比较著名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刊发的《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不仅具有强烈的学术色彩,而且被公认为是正确的政治导向和极高的学术价值完美结合的代表;《复旦学报》1978年10月复刊号刊登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被《人民日报》转载、被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胡耀邦肯定,“是一篇富于时代性和学术性的力作”^[10]。另外,《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发表的《信息智化编辑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学》和1988年第3期发表的《文化结构编辑观》,以及《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发表的《太平天国并不是一次妇女解放运动》和1985年第3期发表的《河南回族分布的历史渊源》等文章,内容极具创新性、学术性;《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刊发的《给胡适在“红学”史上以应有的地位》,被公认为“文革”后最早为胡适的红学给予实事求是评价的少数论文之一^[11];《文史哲》1984年第1期策划刊发的5篇“文化史研究笔谈”,呼吁改变新中国成立后把历史研究等同于经济史、政治史的做法,要求大力加强对于文化史与传统

文化的研究,被认为是1980年代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起点。^[12]这些开放性、多元性的研究,反映了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营造的自由、蓬勃的学术氛围。

三是在学术论文刊发比重、转载数量方面。一般来说,刊发文章的质量如何,与文章的类型关系很大。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刚从“文革”严冬走出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由于还没有建立与健全学术研究的规范和学术共同体的规则、范式,时事宣传类文章、工作总结类文章、教学教案类文章还时有出现,但学术论文比重、转载数量已相当可观。据宋应离先生对1978—1981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的10家学报所发文章进行的统计,学术论文占文章总数的85%以上。^{[6]287}正因为对学术、学理的重视,所发文章的转载率也越来越高。以《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为例,在1980—1981年两年内,仅《复旦学报》就被转载107篇。1982年,《新华文摘》全年12期共摘用学术论文500多篇,其中选自高校文科学报的就有130多篇,约占总数的1/4强^{[6]288}。转载量的增多,学术影响的扩大,既促使高校社科学术期刊进一步保持学术的独立性,规范办刊范式,凸显学术期刊应有的气度和章法,又繁荣了学术研究,为期刊学术质量的提升和中国社科学术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2. 关注现实,推进改革进程

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成为时代的主题词。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作为社会发展与改革的感应器、思想与学术的展播台,不仅追求学术性,同时还十分关注现实、记录时代律动,在推进思想解放、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思想解放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是先声,而思想解放的标志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上,在此之前,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已发表了多篇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文章,实开思想解放风气之先河。例如,《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刊登了梁宁的《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文章;《复旦学报》1978年复刊后第1期开辟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专题笔谈,发表了林永民的《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等7篇文章,其内容都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从理论、学术上肯定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在当时,“两个凡是”大行其道,高校社科学术期刊能发表这样的文章,且不说其学术敏感、学术认知高人一筹,只说其文章内容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敢于率先发表的政治胆识、政治魄力,就已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具有一定的引领和助推作用。不仅如此,当大讨论席卷全国的时候,《武汉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思想战线》、《北京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等一大批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也都组织了相关笔谈、专题,刊发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使以学术理论研究见长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大放异彩,凸显了记录时代、引领时代的特质。例如,面对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拨乱反正,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也刊发了一系列有影响的重头文章,如《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刊发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复旦学报》1978年第2期刊发的《重视知识分子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史哲》1979年第3期刊发的《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历史作用》等。

这不仅使高校这一学术地基上开放出了璀璨的时之花,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营造了历史人物客观评价、学术问题自由争鸣的学术生态环境,推动了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进程。

二是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如果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最引人瞩目的是思想解放和发展经济的话,那么,当时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既在思想解放中赚足了“眼球”,又在面对改革开放亟需解决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新实践、新问题,交出了比较优异的答卷。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我国经济属于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计划和市场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等一些事关改革目标的基本理论问题,学术界曾经发生过激烈争论。《复旦学报》1986年第5期刊发了蒋学模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一文,旗帜鲜明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而1980年代前期,曹凤岐就曾大胆提出要在中国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推行股份制的主张:《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率先刊出曹凤岐的《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之后,《北京大学学报》还连续刊发了“十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文章,为理论界广泛接受,并受到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5]234}该学报也被认为是“国内公开发表‘股份制改革’文章的第一本刊物”^[13]。另外,《郑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刊发的《社会主义财政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刊发的《提高基本建设投资经济效益的关键在于改革》,《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刊发的《我国农村家庭经营是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的新贡献》,《复旦学报》1986年第1期刊发的《论我国当前的结构性需求膨胀》,《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刊发的《工

作日制度的改革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也都论证和回答了“四化”建设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所有这一切,不仅凸显了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在激情荡漾的1980年代积极投身现实问题研究、多方位展现改革成就的特色和风骨,而且也对改革实践和经济建设产生了促进作用。

3. 注重特色,服务高校与区域发展

个性和特色既是期刊的招牌,也是期刊的资本。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刚刚告别了物资短缺、知识短缺、精神短缺和思想短缺的中国,万事万物都散发出蓬勃生机与活力,从万马齐喑中走出来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注重个性,彰显自我,不仅迅速地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发展态势,而且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服务于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或服务于建设经济、传承优秀文化。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注重特色、打造品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所在高校学术方向、学科优势为特色。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处于计划经济阶段的我国高校,其学科建制、招生规模、培养层次、专业特色、学术方向等各不相同,而依托各高校迅速发展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不仅熟悉所在高校的特色、特长、优势、重点等,而且其办刊宗旨、功能、定位等也与所在高校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密切相关。尤其是,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大部分编辑,本身就是高校社科类院系的教师,有些还是重点学科的领导、专家,这使期刊本能地都把展现本校优势学科、特色专业等作为刊物的发展方向。最明显的例子是这一时期新创办的专业学术期刊,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新闻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主办的《比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人口研究》、北京广播学院主办的《现代传播》、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等,均将展现本校本院所的优势学科、特色专业等作为刊物的发展方向,刊物个性特色鲜明,这不仅有利于刊物的健康发展,而且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另外,与专业学术期刊相对应,这一时期的综合性学报也都依据各高校办学层次、办学方针、高校性质、承担的教育任务,以及学术资源状况、科研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开辟特色栏目,打造品牌。例如,一些重点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南开学报》《清华大学学报》等分别在文学、史学、经济学、哲学、新闻学、语言学、历史、政治等传统学科上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师范类名校学报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的教育学、心理学研究等,边疆高校学报如《思想战线》《贵州大学学报》《内蒙古大学学报》《新疆大学学报》的民族学、边疆民族史研究等,地方高校学报如《河南大学学报》的宋史研究、编辑学研究,《深圳大学学报》的特区问题研究等,不仅成功避开了“千刊一面”的尴尬,突出了各自的优势,打造了品牌,展现了“高校+学术”的特色,而且也对高校的学术、学科建设及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助推作用。

二是以高校地域特点为特色。地域优势既包括地理环境优势,也包括历史积淀、人文特色等优势。我国高校众多,分布极不平衡,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高校居多,西部、北部边疆地区高校偏少。而大城市和边疆地区(包括中小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各不相同,依托高校而创办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也各有千秋。目前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中,《殷都学刊》(安阳师范学院主办)的“殷商文化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的“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研究”、《齐鲁学刊》(曲

阜师范大学主办)的“孔子·儒家·齐鲁文化研究”、《许昌师专学报》的“魏晋史研究”等,都已经在1980年代独领风骚。不仅如此,在那个崇尚知识、崇尚文化的年代,学报作为高等学校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学术传播媒介,基本是一校一刊,即使是当时新成立的地方院校(边疆院校)、师范专科学校、地市党校等学术、学科不强的学校,也都有学报编辑部这个组织机构。于是,学科强的拼学科,科研强的拼科研,其他的大多利用学校所在地的地理环境优势、历史文化优势、人文资源优势,或另起炉灶,创办特色学术期刊,或独辟蹊径,创办学报特色栏目。前者如厦门大学1983年创办的《台湾研究集刊》、西北民族大学1986年创办的《西北民族研究》、山东大学的《周易研究》、青海民族大学1989年创办的《青海民族研究》等,现在都是CSSCI来源期刊;后者如《河南大学学报》《河北大学学报》《杭州大学学报》的“宋史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的“中国边疆学研究”、《安徽大学学报》的“徽学研究”等,均发展得较好。师范专科类学报、地方大学学报,如《赤峰师专学报》的“辽金史研究”、《阴山学刊》(包头师范学院主办)的“阴山文化研究”、《开封师专学报》的“清明上河图研究”、《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主办)的“汉代文化研究”、《呼兰师专学报》的“萧红研究”、《许昌师专学报》的“魏晋史研究”、《九江师专学报》的“陶渊明研究”、《衡阳师专学报》的“船山研究”、《承德师专学报》的“避暑山庄诗文研究”,等等,都对发扬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做出了独特贡献。

四、结语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是一个激情迸发的10年,是一个创造传奇、成就神话的10年。就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来说,尽管也存在着办刊模式不完善、刊物策划少、季刊多且刊文量少等

缺陷,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最大的亮点是发展快、成就多、百花齐放,最突出的贡献是为改革开放40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欣欣向荣开了个好头,在中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参考文献:

- [1] 姬建敏.新时期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特征刍议——以1977—1987年为例[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141.
- [2] 史洪智.笔墨春秋——我与《河南大学学报》[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164.
- [3] 郭常英.坚守与求新——纪念《史学月刊》创刊65周年[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47.
- [4] 宋应离.名刊名编名人[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321.
- [5] 李频.共和国期刊60年(1949—2009)[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 [6] 宋应离.中国大学学报简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 [7] 乔家君.中国高校学报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28.
- [8] 马宇红.中国大学学报发展简史[M].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248.
- [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4.
- [10] 章培恒.总序[C]//黄颂杰,吕晓刚,周桂发.光华文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30周年论文精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
- [11] 龙协涛,胡梅娜.润物细无声——社科学报编辑家耕耘录(续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222.
- [12] 刘京希,郭震旦.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以《文史哲》的历史变迁为个案[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150.
- [13] 姚申.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改革与特色栏目建设[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5):82.